

現代佛學  
大系

2

# 敦煌變文

佛教故事類

彌勒出版社

0000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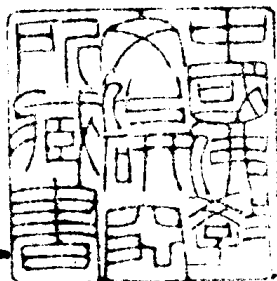
現代佛學大系 2

敦煌

燉

變文

文



彌勒出版社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七月初版

## 敦煌變文

# 現代佛學大系 2

(全套六十冊，恕不分售)

定價：新臺幣壹萬捌仟元整

全書主編：藍吉富

發行所：彌勒出版社

地址：台北縣新店市自由街22號三樓

電話：(〇二)九一一七九三七

郵撥：151566號「彌勒出版社」帳戶

發行人：藍吉富

印刷所：聯和印製廠有限公司

行政院  
新聞局

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二〇五七號

## 敦煌變文七十八種引言

一八九九年的初夏，敦煌千佛洞的藏經洞發見了。藏經洞的藏書總數量大約有兩萬個卷子，此外還有一些畫幡之類的東西。五十多年來「敦煌石室藏書」遭受了種種的變化，至今分散在世界上的各個大圖書館裏：收藏最多的是倫敦的不列顛博物院，巴黎的國家圖書館和我們的北平圖書館。其他如日本、蘇俄以及各國的私人手裏還有一些，不過數量不如以上三處的多。英、法兩國下手最早，掠奪去的都是精品，等到我們去收拾殘餘，贖下的大部分已是糟粕了。

這兩萬多卷的藏書，絕大多數是寫本，一小部分是木刻本。寫本的年代，大概自西元後四世紀末期起，至十世紀末期止。刻本中有西元後八六八年刻的金剛經，首尾完整，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木刻本書。藏書內容絕大多數是佛教經典，下餘一部分爲道教、景教、摩尼教的經典，以及經、史、子、集四部書籍，各種賬籍等等。這些書籍多是漢文，此外也有不少用中亞古代習用的文字如回紇、康居、龜茲、和闐、梵藏等文書寫的卷子。古代敦煌爲「華戎所支一都會」，是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由石室藏書就可以見出其地位之複雜了。

兩萬多卷石室藏書的發見，使中國和西域中古史的研究增加了一大批新的史料，因而引起中外學

者的注意，逐漸形成「敦煌學」的一門學問，在東方學的研究中佔據了相當重要的地位。敦煌學的面是很廣泛的，幾十年來中外學者研究的結果，對於中國和西域中古史作出了不少的貢獻。

但是他們的研究不是沒有缺點的。他們仍然不能擺脫學究派的思想，只注意於正經正史的方面。敦煌石室藏書中有不少的賬籍、轉帖、和民間文學作品，都是研究中古時代社會經濟史和通俗文學史絕好的材料。幾十年來，這一方面的東西，因為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於是傳布既然不多，研究的文章也寥寥可數；像本書所發表的一些作品，就是埋沒不彰的一個顯著例子。

敦煌石室藏書中和文學有關的東西內容很複雜：有唐人的詩，有唐末五代的詞，而最多的是形式和後代彈詞類似有說有唱的說唱體作品。這些說唱體作品的內容，多數取材於佛經，也有不少是取材於民間傳說和歷史故事。本書所收就是以說唱體為主的一些作品。

敦煌所出說唱體的文學作品，最初被誤認為佛曲，如羅振玉在敦煌零拾中所著錄的幾篇，就是這樣標題的。後來因為像目連變、八相變等等，變文的名稱尚保存在原卷之中，於是又把這一類作品泛指為變文。但是像這一類的作品，固然有些是題上變文的名稱的，是否就可以一律稱為變文文學呢？或者還是有其他的通稱呢？二十年來，我們根據唐代段安節的樂府雜錄、盧氏雜說，以及九世紀上半期日本僧人圓仁入唐後所作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知道唐代寺院中盛行一種俗講。後來又發見巴黎藏伯字三八四九號卷子紙背所書俗講儀式，對於俗講的內容算是比較清楚一點了。現在可以肯定地

說佛曲的名稱是錯誤的。同時我們也提出這樣一個說法：唐代寺院中所盛行的說唱體作品，乃是俗講的話本。變文云云，只是話本的一種名稱而已，但變文一稱，世已習用，所以本書仍稱之爲變文。

這些話本如述說秋胡、和廬山慧遠的廬山遠公話等故事，用的是散文體，大概有說無唱。如目連變文、八相變文、王陵變文以及以季布爲題材的歌、詞文、傳文之類，則散文與韻文相間，有說有唱，和後世的講唱文學如彈詞等極其相似。

據日本僧人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的記載，九世紀上半期長安有名的俗講法師，左街爲海岸、體虛、齊高、光影四人，右街爲文淑及其他二人。其中文淑尤爲著名，爲京國第一人。這些人可以稱爲俗講大師，他們所講的話本今俱不傳。現存的作品中有作者之名的只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文末尾提到作者保宣的名子。此外如巴黎藏伯字二一八七破魔變文，北平藏雲字二四號八相變文，末尾都有一段獻詞，可以看出即是話本作者的自述。巴黎藏伯字三八〇八號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又伯字二四一八號父母恩重經講經文，也是出於俗講法師之手。可惜這些人的名子除保宣而外，都不傳了。圓仁還記載了道教的俗講，並提到講南華等經的道士矩令費。至於道教俗講的話本，還沒有見到。

唐代講唱變文一類話本的不限於寺院道觀，民間也很流行，並爲當時士民所喜愛。趙璘因話錄和段安節樂府雜錄都提到俗講大師文淑的故事，說他「聽者填咽寺舍」，說他「其聲宛暢，感動里人」。士民喜愛之情於此可見。全唐詩裏收有唐末詩人吉師老看蜀女轉昭君變詩一首，是唐代還有婦女從

事講唱變文的。吉師老的詩裏有「清詞堪嘆九秋文」和「畫卷開時塞外雲」兩句，前一句指講唱者一定持有話本，後一句則講唱之際並有圖畫隨時展開，與講唱相輔而行。巴黎藏伯字四五二四號爲降魔變文，述舍利弗降六師外道故事中的勞度叉鬥聖一段，卷子背面有圖畫，畫的就是勞度叉鬥聖的故事，每段圖畫都和變文相應，相當於後世的帶圖本小說。這可爲吉師老詩作證明。而現存敦煌話本卷末往往有立鋪等話語，立鋪或一鋪指畫而言。都可以說明開講俗講話本時是有圖畫的。

開講俗講時除用圖畫外，似乎也用音樂伴唱。變文唱辭上往往注有「平」「側」「斷」諸字，我們猜想這是指唱時用平調、側調、或斷金調而言。

唐代寺院中盛行俗講，各地方也「轉」變文。變文之流究竟起於何時？先起於寺院？還是這一類講唱文學，民間由來已久？這一些問題，都因文獻不足，難以確定。我們知道，變文、變相是彼此相應的，變相是畫，洛陽龍門石刻中有唐武后時所刻的涅槃變一鋪，所知唐代變相以此爲最早。因此可以這樣說，最遲到七世紀的末期，變文便已經流行了。九世紀上半期有像文淑法師那樣的名聞京國的俗講大師，「歷事五朝，二十餘年，數經流放，聲譽未墮」，「上自帝王，下至氓庶，無不傾倒；勢力和影響之大，可想而知。

唐代俗講爲宋代說話人開闢了道路，俗講文學的本身，也和宋人話本有近似之點，是宋以後白話小說的一個雛型。一般認爲韓愈「文起八代之衰」，那就是說韓愈一反梁齊以來文章綺靡之弊，改宗

古文。古文運動就是散文運動。文體解放的一個影響是傳奇文學的興起，傳奇就是一種短篇小說。八九世紀以後，正統文學方面古文興起，茁發了傳奇文學。戲曲方面參軍戲、大曲之類也大盛了。這些對於俗講文學都不能說是絕無關係的。

據唐代對於文淑的記載，文淑的俗講，「釋徒苟知真理及文義稍精，亦甚嗤鄙之。」那就是說俗講太淺了，是以不登大雅之堂，不見賞於文人學士。可是也正因為這樣「毗庶易誘」，於是「愚夫冶婦樂聞其說，聽者填咽寺舍，瞻禮崇奉，呼爲和尚。教坊効其聲調以爲歌曲。」成爲民間大眾所喜聞樂道的一種新的文學。這對於宋以後的說話人、話本以及民間文學的逐漸形成，是起了很大的先驅作用的。

首先是俗講文學開闢了一個廣闊的園地，利用種種題材來向民間羣衆講唱。僅就本書所收的變文一類作品而言，其取材已甚廣泛，有佛經，有民間傳說，也有歷史故事。其敷衍佛經故事，目的並不在於宣傳宗教，如講唱舍利弗降六師外道的降魔變，文殊向維摩詰居士問病的維摩變，場面極其熱鬧而又有興味。宗教的意義幾乎全爲人情味所遮蓋了。敷衍民間傳說和歷史故事的如秋胡小說、伍子胥、王陵、季布、昭君等，也都是一般人所喜歡聽的。宋代說話人之講經、說史，在俗講文學中已經有了萌芽了。

其次是採用了接近口語的文字，並蒐集了一部分口語辭彙，爲宋以後的民間文學初步地準備了條件。同時對於人物的心理以及動作，加以細緻的分析和描寫，因而像兩卷本的維摩詰經可以敷衍成爲



數十萬言的維摩變文，在技術方面給後來的話本和白話小說以很大的啓示。

第三、宋代說話人在中國文學史，特別是民間文學方面，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但是過去對於說話人的淵源關係很模糊，文學史的談到這裏戛然而止，無法追溯上去。自從發現了俗講和保存在敦煌石室藏書中的俗講話本以後，宋代說話人的來龍去脈，纔算弄清楚了。對研究中國文學史和民間文學的人而言，這自然是一件大事。不僅如此。清末以來，因為找出了一部分所謂宋人話本，大家便很高興，以為這一發現，一方面知道了「三言二拍」的根據、來源，一方面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宋代說話人的話本情形，為中國文學史的研究寫下了新的一頁。現在所發表的七十八篇文學作品，就時間上講，大概都是唐末到宋初的東西，比所謂宋人話本要早得多。在內容方面，如維摩變文一類，真可以當得起洋洋大文四字，雖然是殘闕不全了，然其波瀾壯闊、氣勢雄偉之處，還可以窺見一二。從研究中國文學史的眼光來看，其價值最少應和所謂宋人話本等量齊觀，為中國文學史的研究者提供了一部嶄新的材料。

# 敦煌變文七十八種敘例

我們整理敦煌變文的計劃和步驟，擬從下面三個方面進行：

一 校印本 把敦煌所出變文和與變文有關的資料，逐錄校勘，排印成爲一個最完備的彙編本，供研究和閱讀古典文學的人使用。

二 選注本 從校印本內選出最優秀的作品，加上簡明的注解，供一般讀者使用。

三 影印本 將可能找到的原卷或照片，用珂羅版影印，以保存原形，供專門研究的人使用。

此敦煌變文集就是我們計劃中的校印本，根據一百八十七個寫本校定成爲七十八種，再依故事內容分編排列。

是集分類，先依歷史故事與佛教故事分爲兩大類。歷史故事又依文體有說有唱、有說無唱和對話體分爲三編，每卷更依歷史時代次序之。佛教故事則依佛（釋迦）的故事、佛經講唱文和佛家故事，亦分爲三編。押座文及其他短文則置于末後，總爲一編。又搜神記與孝子傳包含着變文的原始資料，別分一編。

校印本的主要加工工作是整理與校勘，茲述校輯條例如下：

### 一文題

1 凡有原題者依原題，原題前後題不同者依前題，無前題者依後題。

2 無題者依內容或他書擬補文題，而以「」括之，並在校記第一條內作說明。

### 二底本與校本

1 凡有兩卷以上者以比較完整、比較清晰之本爲底卷，而以他卷校之。底卷在校記內稱原卷，別卷以甲乙丙丁……爲次，並作爲代號。各卷的原編號、題記及書寫殘缺情況，均記入校記第一條。

2 逐錄底卷原文要忠實，凡缺字、誤字、別字及不易認識的字均依原樣逐錄。

### 三校勘體例

1 由于變文是口語，而抄寫變文的人又限于他的學力，所以各本上異文和差別字甚多。因尙有影印本，故校印本稍從嚴，不關重要的異文均從省略，而特別着重在缺字、誤字、別字及不易認識的文字上面，儘可能掃除這些閱讀上的障礙。

2 缺字：底本缺字用□表之，缺幾字用幾□。若不能確定所缺字數，則用□□表之，而在校記內注明約缺若干字。（缺角、殘行、空洞、破字有需說明者亦在校記內注明之。）

3 凡缺字能據別本或上下文補足時，所補之字以「」括之。如底本原是脫誤，則先作「□」，然後旁注補字于（）內。

4 誤字和別字多是因字形或字音相近致誤的，凡是校者以意改正的均旁注于該字之下，而用（）括之；據別本校正的，凡可從者旁注于（）內，再于校記中記明所據何本；次要異文不旁注于（）內，只記于校記中。其他最常見的別體字，如「暫」作「𣎵」或「𣎵」，「慚」作「慚」，「鑿」作「鑿」，一般可以認識者，則不加注解。

5 不易認識的字大概是唐末五代的俗體字，而今已不通行，凡經過研究而能確信者則用誤字，別字例用（）旁注于該字之下，不能確信而又可作一說者，則記所疑於校記內。

6 敦煌寫本中有很多的同聲通用字，如「猶」與「由」、「如」與「而」、「以」與「已」、「列」與「烈」、「事」與「仕」、「士」與「留」、「流」、「感」與「慙」與「敢」之類，在今日閱讀起來有的地方很容易看出，有的地方不容易看出，凡有需要注解方能明顯的地方，亦間採用別字例旁注之。

#### 四 標點與分段

1 散文與韻文分段。韻文分兩層排列；散文內應再分段者提行。

2 基本上採用「標點符號用法」所規定的標點，但有的如破折號，使用極少。

3 問答詞用「」括之。

4 人名用——，書名用~~~~，其餘不用。

5 「」兩符號，校勘文字時專用之，已在「校勘體例」內說明。

附註 我們校勘的原則是絕不改動原文：如認為原卷有誤字脫字之處，另為注出附在下面。敦煌所出通俗文學作品，因為原來是在民間流傳的，所以俗寫別字不一而足。這些俗寫別字，仔細推敲，也有一定的規律：一是多用筆畫簡單的同音字代替原來筆畫繁複的字，如以「交」代替「教」之類。二是結合兩字的字頭成爲一個字，如將「菩薩」二字簡寫爲「并」，「菩提」簡寫爲「蓀」之類。像這些情形，我們都盡量保持原來的字形，而將我們所認為是的正字，注在下面。

編者按：本書原名「敦煌變文集」，共收七十八種變文。茲刪除其與佛教無關者，存四十八種，以供研究佛教者參考。另錄「變文簡介」一文，置之卷首，或可爲初學之一助。

現代佛學大系編輯部 謹按

## 變文簡介

敦煌寫本發現的經過——敦煌寫本的時代——民間敘事詩：太子讀與季布歌等——「變文」的發現——偉大的體製——印度文體的影響——「變文」的產生的時代——「變文」的進展——維摩詰經變文——降魔變文——目蓮救母變文——佛本行集經變文等——非佛教故事的變文：伍子胥變文、明妃變文、舜子至孝變文。

### 一

在二十幾年前（一九〇七年五月），有一位爲英國政府做工作的匈牙利人斯坦因（A. Steine）到了中國的西陲，從事于發掘和探險。他帶了一位中國的通事蔣某，進入甘肅敦煌。他風聞敦煌千佛洞石室裏有古代各種文字的寫本的發見，便偕蔣某同到千佛洞，千方百計，誘騙守洞的王道士出賣其寶庫。當他歸去時，便帶去了二十四箱的古代寫本與五箱的圖書繡品及他物。這事與中世紀的藝術、文

化及歷史關係極大。其中圖畫和繡品都是無價之寶，而各種文字的寫本尤爲重要。就漢文的寫本而言，已是近代的最大的發見。在古典文學，在歷史，在俗文學等上面，無在不發見這種敦煌寫本的無比的重要。這消息傳到了法國，法國人也派了伯希和 (Paul Pelliot) 到千佛洞去搜求。同樣的，他也滿載而歸。他帶了不多的樣本到北京，中國官廳方才注意到此事。行文到甘肅提取這種寫本。所得已不多。大多數皆爲寫本的佛經，其他略重要些的東西，已盡在英、法二國的博物院、圖書館裏了。又經各級官廳的私自扣留，精華益少（今存北京圖書館）。但斯坦因第二次到千佛洞時，王道士還將私藏的寫本，再掃數賣給了他。這個寶庫遂空無所有，敦煌的發現，至此告了一個結束。

千佛洞的藏書室，封閉得很早。今所見的寫本，所署年月，無在公元第十世紀（北宋初年）之後者。可見這庫藏是在那時閉上了的。室中所藏卷子及雜物，從地上高堆到十英尺左右。其容積約五百立方英尺。除他種文字的寫本外，漢文的寫本，在倫敦者有六千卷，在巴黎者有一千五百卷，在北京者有八千五百卷。散在私家者尙有不少，但無從統計。這萬卷的寫本，尙未全部整理就緒，在倫敦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也尙未有目錄刊出。其中究竟有多少藏寶，我們尙沒有法子知道。但就今所已知者而論，其重要已是無匹。研究中國任何學問的人們，殆無不要向敦煌寶庫裏作一番窺探的工夫，特別是關於文學一方面。

上文已說到敦煌所發現的民間俗曲及詞調。此外尚有更重要的民間敘事歌曲及『變文』。民間歌曲今所見者有孝子董永、季布歌、太子讚等，都是氣魄很弘偉的大作；雖然文辭有些粗率的地方，但無害其想像的奔馳，描狀的活潑。太子讚敘述釋迦牟尼出家修道事，以五七言相間成文，組織另具一體，像：『車匿報耶殊，太子雪山居。路遠人稀煙火無，修道甚清虛』云云，當是以五七言體去湊合了梵音而歌唱着的，故不得不別創此新體。孝子董永敘董永行孝事。民間熟知的二十四孝，便有董永的一『孝』在着。此故事最早的記載，見於傳爲劉向作的孝子傳。（太平御覽卷四百十一引，又見漢學堂叢書）干寶的搜神記也有之。董永父母死，無錢葬埋他們，乃賣身於一富翁家。中途遇天女降下，嫁他爲妻。生一子後，又騰空而去。這大約是一個很古遠的民間傳說，和流行於世界最廣的『鵝女郎』型的故事是很相同的。但孝子董永後半所說董仲尋母事，卻是他處所未有的。後來的民間傳說，乃以董仲爲漢初的董仲舒，更是可笑。孝子董永全篇皆用七言，白字連篇，間有不成語處。但無害其爲很偉大的敘事詩。季布歌也是如此，全篇也都是七言的。敘的是：季布助項羽以敵劉邦。邦得天下後，到處搜購布。布卒得以智自脫。尚有一種季布罵陣詞，當是本文的前半段。

### 三

但敦煌寫本裏的最偉大的珍寶，還不是這些敘事歌曲以及民間雜曲等等。它的真實的寶藏乃是所



謂「變文」者是。「變文」的發現，在我們的文學史上乃是最大的消息之一。我們在宋、元間所產生的諸宮調、戲文、話本、雜劇等等都是以韻文與散文交雜的組成起來的。我們更有一種弘偉的「敘事詩」，自宋、元以來，也已流傳于民間，即所謂「寶卷」、「彈詞」之類的體製者是。他們也是以韻、散交組成篇的。究竟我們以韻、散合組成文來敘述、講唱，或演奏一件故事的風氣是如何產生出來的呢？向來只當是一個不可解的謎。但一種新的文體，決不會是天上平空落下來；若不是本土才人的創作，便當是外來影響的輸入。在唐以前，我們所見的文體，俱是以純粹的韻文，或純粹的散文組織起來的。（韓詩外傳一類書之引詩，列女傳一類書之有「讚」，那是引用「韻文」作為說明或結束的，並非韻散合組的新體的起源。）並沒有以韻文和散文合組起來的文體。這種新文體究竟是如何產生的呢？在什麼時候產生的呢？最可能的解釋，是這種新文體是隨了佛教文學的翻譯而輸入的。重要的佛教經典，往往是以韻文散文聯合起來組織成功的；像「南典」裏的本生經（Jātaka），著名的聖勇（Aryasura）的本生鬘論（Jātaka-mālā）都是用韻、散二體合組成功的。其他各經，用此體者也極多。佛教經典的翻譯日多，此新體便為我們的人文學士們所耳濡目染，不期然而然的也會擬仿起來了。但佛教文學的翻譯，也和近來的歐洲文學的翻譯一樣，其進行的階段，是先意譯而後直譯的。初譯佛經時，只是利用中國舊文體，以便於覽者。其後，才開始把佛經的文體也一並擬仿了起來。所以佛經的翻譯，雖遠在後漢、三國，而佛經中的文體的擬仿，則到了唐代方才開始。這種擬仿的創端，自然先由和佛典最接近的文人們或和尚們起頭，故最早的以韻、散合組的新文體來敘述的故事，也只限於經典裏